

明代佛教 与政治文化

周齊 著

MINGDAI
FOJIAO
YU ZHENGZHI
WENHUA

人
民
出
版
社

明代佛教 与政治文化

周齊 著

MINGDAI
FOJIAO
YU ZHENGZHI
WENHUA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周齐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8

ISBN 7-01-004889-4

I. 明… II. 周… III. 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9232 号

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

MINGDAI FOJIAO YU ZHENGZHI WENHUA

周 齐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数:20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4889-4 定价:1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杜 继 文

周齐同学让我为其大作写序,未经思考,就一口答应下来。这原因,一是人很熟,不得不写,不能不写;一是我对明清佛教基本无知,希望借此机会增加一些了解。实际上,后者才是主要的。

结果,只重点读了几章,就已经提高了不少认识。明代是把君主专制主义推向顶端的封建王朝:朱元璋出身流氓无产者,出家作过和尚,有长期混迹于红巾军的经历,有利用宗教造反的经验,所以他作了皇帝以后,不但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手段,对于文人和宗教也会保持高度的警觉。朱棣搞“靖难”之变,以“清君侧”的名义武装夺权,按封建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实属于背亲叛上,大逆不道,因而对于社会舆论的控制,所谓文化专制,自然也会非常的残酷。清代的文字狱,恐怕就是继承明代的衣钵来的,雍正的《御制拣魔辨异录》就是制造佛教文字狱的一个标本——这是我的看法。因为,现在有人据此而颂扬雍正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融人王兼法王之尊于一身的帝王”了。

总而言之,我的老印象是:由于明王朝采取全面的高压政策,对于宗教问题尤其敏感,所以导致了明代佛教的萎靡不振。周齐的著作则告诉我,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如洪武初期,“江南名僧大老大多被诏”,“到了京城做了新皇帝的嘉宾,并诚惶诚恐地为新朝祈福。而新皇帝在平时的日理万机之中,还时常抽时间与其赏识的僧人坐而论道。甚至阅藏著述,发表议论,对佛教确实关注有加……普通僧人也可以随意‘日讲夜禅’地游方。朝廷还免除了以前出家时要交官府的免丁钱”。朱元璋是如此优渥佛教,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周齐特别引用了《明史·李仕鲁传》,对我很有说服力,实在值得这里复引,也供同好们一看。其文曰: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斓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唯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自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缙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缙流憸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制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数万。”就是说,朱元璋不只请少数僧侣入京做大官,而且普遍提升僧道的品秩,致使他们能够横行霸道,干预朝政,毁谤勋旧,离间开国重臣与朝廷的关系。

陈汶辉所谓“缙绅缙流,杂居同事”,指的当是僧侣作为一

个特殊阶层参政,而不是个别僧尼的从政,所以他才说,他未之闻也。实际上,个别僧侣的干政,在中国不是新闻;佛教应该干预世事,也是大乘的本来教义。但这有个前提,那就是佛教作为出世法的身分绝对不容改变。这个原则在东晋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经确立起来;北方少数民族国家的僧侣虽然早就主张礼拜王者,也是以坚持沙门法与世法有本质不同作条件的。宗教就是宗教,而不应该成为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在总体上是与国家政权协调的,但却始终保持它们独特的宗教身分,而没有形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国家政权虽然可以礼遇宗教,善待宗教,甚至请它们扶持教化,也始终没有把宗教作为国家机器来使用;至于把国民的希望和国家的前途寄托在宗教身上,只有少数末代皇帝和发昏的文人幻想过,时代很快就把他们淘汰了。因此,中国内地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体制,也没有这方面的传统。北魏律僧的权力极大,然而只能行之于佛教内部;梁武帝晚期,佞佛以至于痴迷,但他的政权也不是政教合一的。他卖身给僧为奴,是个人行为;他围攻《神灭论》发动了王公大臣,却没有任命僧人为他当国。相比之下,明太祖走得就相当远了。他不是给佛家为奴,而是企望佛教能在政治上帮他当家,助他掌权。他普遍抬高僧人的政治地位,将僧人自我管理的机构官僚化,拔擢僧人作大官,是一种组织措施;他撰写《拔儒僧入仕论》、《拔儒僧论》等,是他制造的理论根据;“诏通儒术僧试礼部”,则是把他的理论制度化。朱棣显然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相当见效:他之敢于悍然起兵夺权,就是僧人道衍给他出的主意。道衍(即姚广孝)是朱棣最重要的谋士,也是他筹划夺权的实际指挥者。不过道衍很聪明,功成名就,不是得

意便猖狂,而是依旧常居僧寺:上朝穿官服,避免了缙绅与缙流杂居同事的讥嫌,下朝穿僧衣,仍然保持缙流的本色。

李仕鲁反对朱元璋崇佛的出发点,与陈汶辉略有不同,他不只是耻于同缙流杂居同事,而且因为他推崇朱氏儒术,是出于文化思想上的考虑,所以他上疏谓:“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此“异端”指佛教,“圣学”就是朱熹的新儒学。就是说,李仕鲁是在为明太祖设计“万世法程”、确定统治思想的。但朱元璋不买账,于佛教似乎确实“深溺其教”,竟“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也没有好下场,“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

在政治斗争中,僧道起的作用确实不可忽视,但多限于个人行为,与作为一个宗教整体的关系并不总是很大的。道衍之于明成祖,刘秉忠之于忽必烈,都是在改朝换代中赫赫建功立业的人物。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个人的社会政治才能,并非因为他们的佛教徒身分,也不是他们利用了佛教的教义或把佛教作为社会力量去运用。朱元璋的特殊经历,有可能使他的判断失误,那就是过高地评估了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以致认为在造反期间可以利用的东西,只要略加调整,在建设和巩固政权中同样可用。严禁白莲教,高扬佛道教,可能就是他的重要调整方案。因此,他不能允许有反佛的言论立脚。

其实,中国佛教的发展和演变,几乎都是在反佛排佛限佛的声浪中进行的。历史上,即使再佞佛的王朝,也没有对佛教说不者处死的先例。前述的梁武帝,对待《神灭论》止于文字上的围剿,而对作者范缜,却是官照样请他做的;宋代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持论可谓激烈,遭遇的仅仅是贬官流放。在我们的历史

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思想和信仰上是相对自由的。所谓“三武一宗”的毁佛运动,以及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暴动与起义,主要是基于社会和经济问题,与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关系。朱元璋破坏了这个传统,采用了血腥手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为了引入佛徒治国而逼杀大臣,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此后的封建帝王多用血腥手段强化文化专制,并当做常态,朱元璋应该是始作俑者。

据周齐看,朱元璋从提拔僧人做官到对佛教实行官僚化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直接导因当是“胡惟庸谋反”事件以及他从中吸取的教训。所以,官僚化管理的重点,不再是纵容佛教的扩展和佛徒的猖狂,而是对佛教的整饬检肃。佛教干政不当,佛徒腐化横行,都是对君主权威的侵犯;尤其是佛教与官吏及下层民众的密切接触有可能引发非常事件,更使明太祖不安,因此他采取行政手段加严了对佛教的严密控制,其中的体现之一,是分裂统一的佛教为禅、讲、教三等,只许它们各行其是,不得逾越;同时规定,僧人一律不得结交官府,悦俗为朋,其有犯者,同样要处以“重罪”,或“杀无赦”。总之,目的在于尽可能地将佛教“纳入国家机器的运转轨道”,使之成为“更好用的辅助工具”。

因此,不论是优渥还是整肃,都以皇帝的统治需要为转移,而佛教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空间,也就丧失殆尽。难怪被擢拔为大官,受宠于皇帝的名僧如宗泐辈,也是以“苦”字作为临终遗言——当然,名利熏心者例外。

顺便指出,“胡惟庸谋反”,也应该是封建主义政治史上的大事。因为这个事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废除丞相制,揽天下庶务于皇帝一身。于是,王朝就不再是一个阶级的代表,甚至不是

一个集团或家族的代表,而成了君主个人的统治工具。宗法的社稷观念隐退了,君主的个人至上主义强化起来,忠君就变成了忠于某个人。这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也是一大变化。如众所知,像孟子、董仲舒这类大儒,都是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思想家,但同时也都主张限制君主的个人独裁,把“民”作为制约君主权力的对立面。中国佛教也有类似的倾向,像《六度集经》表达的就十分清楚。明太祖取消了以宰相为代表的封建国家机构,独揽全权于一身,实际上是抛弃了这个传统。这也直接影响了明王朝对佛教的决策:究竟是利用还是高压,全看它对于君主个人的专权是利还是有害,甚至没有像魏晋以来,首先从意识形态的是非上,或从社会经济的利弊上考虑。这样的佛教,一切望着王朝的脸色行事,成了君主个人的专制工具,所以不论在教理原则上还是宗教实践上,都很难有什么新的创造、新的进展。佛教在明代的衰落,这个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周齐在综述朱元璋的统治思想时,引了《太祖实录》中的一句话:“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又据朱元璋在《游新庵记》中所说:“帝王佞于佛道,必将怠政而致国废……帝王若要‘永为人皇’,应做的是‘宵衣旰食,修明政刑’,以使‘四海咸安,彝伦攸序’”。据此或可以认为,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务实的开国皇帝,明太祖对于宗教在整体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功能有清醒的认识,主张治国,应兢兢业业,放在“修明政刑”之类的人事上。

由此我倒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来:“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这段话我曾用于一个有关新宗教和新时代运动在当代中国的调查报告,后来在公开出版的时

候,接受一位老领导的建议,把它删去了。现在想想,这话似乎仍有警世的作用,所以在这里重引一遍,也算给那些热炒宗教兴国或宗教救国论者泼点凉水。

自序

这段文字是应该作为“后记”的,因为这本书已经完成三年多了,现在已不容易接续当时的写作思路来为此书作介绍。但鉴于此书特别选择了一个考察和论述的角度,有必要在书前有所交代。好在这毕竟是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而完成的课题,因而在为此次出版作修剪的过程中又拾起了一些思绪片段,加上与搁置此书有关的一些想法等,一并连缀起来,作为此书的一个引言。

“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顾名思义,是探讨和研究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但在此要解释的就是,这个探讨和研究实际上只是选择了以政治文化为观察视角、参照背景和论述的角度,主要的目的则是探讨明代佛教的一些问题。

之所以选择以政治文化为研究视角,是由于在研究明代佛教的过程中,每每被一些佛教与世俗政治或传统文化及社会变化等因素关联或交织的现象和问题所困扰,于是希望寻找一种可以比较清楚条理地处理和解释的方法及理路来研究和论述这样的一些问题。因而在研究方法的调整中了解到,当代政治学中关于政治文化的理论,就是特别着眼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文化、信仰等因素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即如这个学说的开拓者定义

的那样,“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①因而这个理论给人一个重要启发,即其理论界定有助于条理明代佛教与世俗社会的一些混杂问题。虽然政治理念及政策决策等不等于政治文化,但却是政治意识及价值观等政治文化要素的具体体现,而明代佛教涉及的那些问题,也不外是在那个时期流行的政治理念、宗教认识和世情倾向等现实政治文化环境中诸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问题,明代佛教应是明代政治文化关系链上的一个关联因素。这样一种探讨社会体系中的相互关系的论理途径,应该对于处理明代佛教与社会诸因素的错综复杂关系有可借鉴的成分。

尽管如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明代佛教,这种以政治体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是否能具体地适用则仍然是要慎重考量的问题。因为即便是由相关基础知识亦可知,明代佛教在社会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是不明显的。但是,思路或许也可以这样推演,即,佛教虽然不是明代政治体系过程中主动的活跃的因素,但佛教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已经使其成为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资源,对于世人的观念和心理及价值判断等都产生有深刻的影响,故而明代佛教与社会诸因素扭结的问题与明代社会之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即可说是互为因果的,加之对于明代社会和佛教状况的概略了解,遂大致可以判断,政治文化应该可以作为考察明代佛教相关问题的一个合适的和有助益的研究视角和参照背景。

①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之有关介绍。

既然是研究视角,那么什么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视角里观察是较为理想的呢?事实上,选择政治文化的观察视角,相关的理论界定,即方便了对一些错综关系的条理和考察。在这个视角下的理论规范的视野里,一些杂乱的现象则凸显为不同方面的问题,所以,在当时的研究水平基础上,一眼扫过的要关注的一些问题,基本就构成了后面书中所列出的章节题目。如,在第一章介绍的帝王与佛教的关系,即着重分析在明代不同时期,明代诸帝王及统治阶层对于佛教的认识和态度以及价值判断等方面,如何既有一贯的表现又有不同的变化,而由政治文化的角度则可以比较清楚地和条理地议论,其实即不外与其所秉承之政治文化传统及现实政治文化环境因素之变化直接有关。相应地,在第二章中讨论的明代统治者所推出的佛教政策,其具体内容的选择和侧重,也显然表明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流行的对于佛教的认识和对于一些政治伦理观念的认同。而第三章和第四章所涉及的明代儒家对于佛教的认识和态度,以及明代佛门高僧的处世之道,既反映了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释、道三教不断竞争和融通的消长关系,亦清楚地显示在一以贯之的政治文化传统背景和明代现实政治文化环境变化中,佛教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与流行的政治理念及伦理价值观以及宗教认识是紧密关联和相互影响的。正是因为由这样的研究视角考察问题,因而也就得出了第五章所做的相关概括性的推论,即,经过千百年与本土文化调整和整合后,明代的佛教已经基本上同构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之臣属型的王权至上的政治意识深刻影响着明代佛教的地位和政治取向;而伦理型的政治观则通过世俗社会对佛教的要求和对僧格的价值评判影响

了佛门的政治态度乃至影响了僧人的处世态度;中国社会整合趋势的政治文化背景对明代佛教的发展走势更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比较而言,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可看做是一个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政治文化传统及现实政治文化环境的极其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这样的尝试性方法探索带来了研究方面的收获,也应包括一些相关思考。由于选择了适用的考察角度,在具体的研究中,的确是启发了对相关现象的关联性思考,并有助于处理一些混杂问题的条理性考察和解释。同时,通过这种注重研究角度和方法的研究,提高了对于所谓现代知识体系下佛教研究方法问题的重视,这应是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连锁效应。所以,课题虽然完成了,却有意犹未尽之感,只好将其搁置。恰值这时得到了去哈佛大学访学的机会,即在探询相关理论流行情况中得知,亦有采用政治文化理论探讨当今世界宗教中原教旨主义之兴起的研究。^①虽然相关的新信息有助于加强由此角度考察宗教问题的信心,但也从中得到一点启示,即,佛教尤其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佛教,以政治学相关知识体系的术语说,即大概属于亚功能系统方面的内容,因而用政治文化这个以政治体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所提供的取景模式来作为佛教研究的取景视角,虽然是适用的,但研究问题的筛选和论理路径等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方面。只是出于当时的研究热情,看到的问题很多而且亦多感兴趣,所以在这个视角下得到了一张颇为丰富的画面。或许还需要有所侧重地进一步研究。

① 参见 *Strong Relig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不管怎样,这样一个采取政治文化视角的研究成果,在提供了新视角探索研究的同时,至少还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具体内容,尤其在目前而言,明代佛教研究依然还是中国佛教研究中比较薄弱的方面,因而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以引发一些思考。曾经跟一些朋友讨论过,很想以这样的一个作品来作为靶子,让相关研究的同道进行一次切磋、批评。但终是机缘不凑合。现在这书出版了,机缘应该来了。所以,真诚希望获得批评、指教。

不过在希望批评、指教到来的同时,还是先要将一些感谢的话说出来。这项研究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基金和出版基金的支持,从而促成了这个尝试性的探索研究,所以很感谢能在一个条件良好的研究单位从事学习和工作。还要感谢一些给予指导和帮助的学术前辈和同事。首先要感谢杜继文先生,不仅因为杜先生不吝为本书撰序,更因为无论是佛学知识还是佛学研究的工夫,都由杜先生那里所获很多,而杜先生之奖掖后学更令从学者获得研究之外的感染。而说到感染,尤其要感谢的还有余敦康先生,常常是蹭饭之余还获得很多学问方面的具体指点,在感受余先生之思辨风格的同时,实则得到很多潜移默化的教益。给予了令人感激的鼓励和支持的还有罗炤先生、方广钊先生、魏道儒先生、何劲松先生,和难以在此一一列出名字的朋友同事,以及一些研究著作的作者。另外,还要感谢台湾的江灿腾先生提供了一些书籍支持。当然,本书得以出版,还因为得到人民出版社和方国根编审的鼓励和支持,这实际也是对继续研究工作的鞭策。只是,在说这些感谢的话的时候,还是会因为向私淑老师们和朋友们交了一份尝试性探索研究的作品而感到忐忑。好在,既由佛教哲学受益,也爱道家“上善若水”的哲理,所

以,无论是随因缘,还是顺自然,只要思想着! 正所谓“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是也。

周齐 2004 年暑假,北京永安南里如庵。

目 录

序 杜继文 (1)

自序 (8)

第一章 明代佛教与帝王及其政治文化

环境 (1)

第一节 明太祖对于佛教的认识和

态度 (5)

(一) 明太祖的佛教因缘与明初

佛教 (6)

(二) 明太祖的佛教认识与传统政治

文化 (10)

(三) 明太祖对佛教的实际态度与

明初政治文化环境 (26)